

# 中國對葡文化外交的歷史與現狀

曾祥明\*

葡萄牙開闢了航海時代，其後的興衰成敗對當前中國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本研究在系統梳理中國對葡文化外交的價值功能、演進特點、現實挑戰的基礎上，從文化軟實力的視角提出了促進中國對葡文化外交的發展策略，以維護中國在葡語世界的國家利益。同時，鑒於近代意義上的中國和西方的關係是在中葡關係的基礎上得以較早地建立、發展並演變至今的，本研究將對中國文化外交的理論思考與具體實踐提供參考價值，對我國正在開展的“一帶一路”戰略實現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

## 一、中國對葡文化外交的歷史回顧

### （一）1949至1978年間對葡文化外交維護了我國的主權利益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為打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聯盟的封鎖和遏制，我國的外交採取了三個策略：一是倒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二是爭取新興獨立的廣大亞非拉國家，三是保留港、澳的現有地位，對其“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澳門是中國對外聯繫的視窗，以葡萄牙為代表的葡語世界則是中國所爭取的。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當天，中方即以公函的形式將《毛澤東主席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公告》送達包括葡萄牙政府在內的各國政府，並且表達了“中國政府願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原則的基礎上與世界各國建立外交關係。”<sup>1</sup>於葡萄牙方面，中國是通過葡萄牙原駐南京公使豐賽嘉（J.B. Ferreira da Fonseca）代轉的。豐賽嘉

\* 中國礦業大學（北京）思想政治教育學院講師。

1. 曹月柱：《建國前夕毛澤東的執政構想探論》，中共太原市委黨校學報，2005年第4期，第16頁。

收到公函後，立即將公函及所附“公告”的內容電告葡萄牙政府，並於1949年12月10日將原件轉交給葡萄牙外交部。與此同時，還呈送了一份關於承認新中國問題的長篇報告。<sup>2</sup>此外，葡萄牙原駐廣州總領事馬嘉良士（J.C. de Magalhães）、駐上海總領事西蒙士（A. Lopo Simões）、駐香港總領事布拉藏（E. Brasão）、葡萄牙外交部秘書長兼政務司司長法利亞（A. de Faria）和澳門總督柯維納等人都積極呼籲“承認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國建交。”<sup>3</sup>但此時的葡萄牙政府為“借助美國的軍事及政治勢力，維護其獨裁統治及葡萄牙在澳門的地位和利益”<sup>4</sup>，採取了緊隨美國的對華政策。在中葡關係的核心——澳門問題——上堅持妄圖繼續實施殖民統治的不合作態度，並“始終把英國作為靠山，將香港作為參考，處處與英國攀比……還採取抵賴和拖延的對策……堅持只要英國人不退出香港，葡萄牙人就不交還澳門。”<sup>5</sup>葡萄牙對華政策的根本是維護其在華利益，核心是繼續在澳門強行進行殖民統治。<sup>6</sup>再者，新中國建立後，出於防止美國的全面封鎖、避免對蘇聯的過分依賴及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等方面的考慮，對澳門採取了“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並未急於收回澳門。以及由於大的國際環境決定中國站在社會主義陣營一邊，與葡萄牙等資本主義國家分屬不同戰線。由此一來，中葡兩國之間接觸甚少。僅有的幾次接觸都是為了處理澳葡當局藉口澳門“水路界線”不清，侵犯中國領土和領水主權而引起的兩次衝突<sup>7</sup>及葡萄牙政府和澳葡當局為困守對澳門的殖民統治而製造的兩次事件。<sup>8</sup>在這些重大事件中，中方為了

2. 黃慶華：《中葡關係史（下冊）》，安徽，黃山出版社，2006年，第1059、1072及1075頁。

3. Moisés Silva Fernandes. *Enquadramento das relações luso-chinesas entre 1949 e 1966*, in administração Macau, No.40, vol.XI, 1998-2, p.305.

4. 黃慶華：《中葡關係史（下冊）》，安徽，黃山出版社，2006年，第1059、1054及1191頁。

5. 黃慶華：《中葡關係史（下冊）》，安徽，黃山出版社，2006年，第1059、1054及1191頁。

6. 澳門是葡萄牙在華的最大利益，葡萄牙政府及澳葡當局一直妄圖對澳門的“殖民統治”長期的繼續下去。但是受到葡萄牙國力、世界反殖民主義、中國實力、中葡之間並沒有條約直接指出澳門歸葡萄牙所有等因素的制約，澳葡當局總是處於擔心害怕之中。

7. 1950年3月6日的過路環事件和1952年7月25日至8月25日的關前門衝突。

8. 1955年葡萄牙籌劃所謂的“葡萄牙據澳400周年慶典事件”和1966年12月3日製造的“一二·三慘案”。

維護國家利益及澳門同胞的正當權利，對葡方進行了有理有力有節地反擊。既對葡萄牙政府與澳葡當局發出嚴厲通牒，也釋放準備封鎖澳葡當局的口風，更積極採取對澳門同胞的文化宣傳，爭取澳門華人的理解與支持。

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中美關係的改善、葡萄牙1974年“四·二五”革命的成功、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以及澳門問題的不可回避性，葡萄牙開始尋求與中國接觸，緩和兩國之間的緊張關係。1974年9月13日，葡萄牙外交部長蘇亞雷斯（Mário Alberto Nobre Lopes Soares）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確切地講，澳門不應被說成是葡萄牙的一處殖民地，它不過是一個商業中心……有關澳門的問題，自然應該以雙邊會談的形式同中國進行交涉，以便確定澳門新的地位。我們願意同中國發展關係。”<sup>9</sup> 1976年4月25日，葡萄牙革命後的第一部《共和國憲法》沒有把澳門說成是葡萄牙殖民地，而是說澳門是“葡萄牙管理下的領土”。<sup>10</sup> 至此，關於澳門的主權歸屬問題得到了原則性解決，為中葡關係發展掃除了根本性的障礙。

與此同時，積極通過雙邊或多邊活動讓外界更好地瞭解中國。如，1955年中國在萬隆會議上向國際社會真摯表達願意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與世界各國友好往來。隨後，中國派出大量文藝代表團前往廣大亞非拉國家開展文化交流活動。這些文化交流活動增進了彼此之間的情感和認同，擴大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際影響力。為中國與莫三比克等葡語國家建交做了必要的文化準備，也推動了葡萄牙社會對新中國的積極認識。在文化先行的帶動下，這一時期我國與莫三比克等5個葡語國家建交，實現了國家關係正常化。此後，隨著中葡兩國國內形勢以及所處國際環境的變化，中葡雙方都認識到了破除外交壁壘、確立雙邊合作的重要性，鼓勵通過文化交流活動為1979年中葡建交做好鋪墊。

---

9. 中華文本庫：“香港回歸和澳門回歸難度的比較”，參見<http://www.doc88.com/p-493504397610.html>，2016年5月18日。

10. Moisés Silva Fernandes, *Sinopse de Macau nas relações Luso-Chinesas*, 1945-1995, Cronologia e Documentos, pp.278, 676

## （二）1979至2002年間對葡文化外交促進了我國的政治利益

葡萄牙1976年新憲法關於澳門是葡萄牙治理下的中國領土的開放性定位為中葡關係發展迎來了新的機遇。經過努力，中葡雙方於1979年2月8日發表《聯合公報》確立外交關係，並特別聲明“澳門是中國的領土，只是由於歷史原因暫且處於葡萄牙的治理之下”。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也促進了中葡兩國的往來。此後，中葡關係進入了良性發展階段。但就影響兩國關係的重點——“澳門問題的談判仍然是艱難的，甚至出現了葡萄牙方面以隨時準備退出談判來威脅中國讓步的局面。”<sup>11</sup> 因此，建交後，就澳門回歸的時間、方式等及其圍繞回歸所做的外交宣傳、文化交流、民間往來是這一時期中葡關係的焦點。

按理說，在解決了澳門屬於中國領土的原則問題後，就澳門回歸的具體問題的談判應該是比較簡單的，但由於“葡萄牙方面的某些虛榮心理，事事處處都不忘維護體面，總設想談判不能匆忙草率，相比中英香港問題談判兩年的時間，中葡澳門問題談判也應拖上一年左右時間，並且還要設置一些‘障礙’，安排一些‘插曲’，以‘豐富’談判的內容，否則，在世人面前，與英國人相比，葡萄牙人豈不是少了許多光彩！”<sup>12</sup> 面對葡方這樣的談判心態，中方適時發揮文化外交的功用。第一輪談判開場時，具有“詩人外交家”之稱的中方代表團團長周南即吟詠唐代詩人孟浩然《渡浙江問舟中人》的詩句“潮落江平未有風，蘭舟共濟與君同”，深深地表達了希望與葡方一起攜手解決好澳門的未來前途問題。第二輪談判入場後，周南在與葡萄牙代表團團長梅迪納擁抱後，講述了一段有關中國東晉著名畫家顧愷之倒吃甘蔗的故事<sup>13</sup>，借用“漸入佳境”這個典故，一方面比喻中葡談判漸入佳境，另一方面也是對談判的美好期待。第二輪談判結束後，由中

11. 譚志強：《澳門主權問題始末（1553-1993）》，臺灣，永業出版社，1994年，第281-286頁。

12. 黃慶華：《中葡關係史（下冊）》，安徽，黃山出版社，2006年，第1059、1054及1191頁。

13. “愷之每食甘蔗，恒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漸入佳境’”，見《晉書·顧愷之傳》，意謂甘蔗下端比上端甜，從上到下，越吃越甜。

國代表陪同葡萄牙代表團到中國部份名勝古跡參觀，希望他們在更深入瞭解中國社會文化後增進對中國的認識，推動談判的進展。在第三輪談判時，周南吟誦了唐代著名詩人劉禹錫的七言絕句《秋詞》：“晴空一鶴排雲上，便引詩情到碧霄。”<sup>14</sup>周南用這些詩詞寄託著對談判的良好祝福。這一幕幕美好的畫面為談判增添了情境與意境，推動著談判的最終順利結束。

在澳門政權過渡期，中國也在全力促使葡萄牙和澳葡政府實現“中文官式化”“公務員本土化”及“法律澳門化”。如，澳葡政府在1989年2月20日頒發的《政府公報》上指出，“有關澳葡政府的法律檔必須同時以中葡文在公報上刊登方能生效的法令”。葡萄牙政府1991年12月31日頒佈的第455/91號法令宣佈“中文在澳門與葡文具有同等之官方地位及法律效力”。<sup>15</sup>世紀之交時，部份案件已可以直接用中文進行審理。1999年12月21日，文化部在澳門文化中心舉辦了“愛我澳門，愛我中華”的大型文藝晚會。文藝晚會由“序幕”“天一千秋中華”“地—錦繡中華”“人—情繫中華”“和—愛我中華”及“尾聲”組成，充分地展示了中華兒女血濃於水的綿綿親情和對中華山川大地的深深眷戀。澳門回歸為中葡關係發展迎來了春天。

### （三）2003年以來對葡文化外交拓展了中國的各項戰略利益

2003年中國與葡萄牙等葡語國家在澳門設立“中葡論壇”，這是一個以葡萄牙語言文化為紐帶的制度化合作機制，標誌著中葡關係發展進入了一個全新時期。

經濟領域，中國與葡萄牙及葡語共同體的貿易額從2003年論壇初設時的100億美元，增長到2012年的1288億美元，整整翻了十餘倍，令人鼓舞。2003年中葡雙邊貿易額僅有5.96億美元，到2012年出現一

14. 唐代劉禹錫：“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晴空一鶴排雲上，便引詩情到碧霄。”，見《秋詞》。

15. 黃啟臣：“澳門主權問題始末”，《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2期，第92頁。

個高峰，達到40.15億美元，之後受世界金融危機影響有所下降，但也能保持在30億美元上下。葡萄牙正在成為中國資本開拓歐盟市場與葡語國家市場的重要視窗。政治領域，中葡雙方相似的國際處境使得彼此在諸多國際議題上具有相似的看法，能夠更好地理解對方的國際政治訴求，達成較好的默契或戰略合作關係。並於2005年建立了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中國與葡萄牙之間的政治與外交關係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文化領域，中葡之間的交流合作也取得了較大進步。在中葡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框架下，中葡簽訂了一系列文化教育合作協定，以擴大中葡人文交流，促進中葡文化往來，深化中葡在語言、文化、旅遊等領域的全方位合作。以中葡之間的留學生教育為例，據不完全統計，2015年底中國大陸籍留葡學生大約有460名，其中由中國政府公派約40名，主要集中在里斯本大學、里斯本科學技術大學、科英布拉大學等葡萄牙著名大學。在中國大陸的葡萄牙籍留學生也日益增多。2008年約有220名葡籍學生主要分佈在北京、上海等高校，2011年增加到385名。文化合作增進了中葡之間的瞭解與信任，也一定程度上培養了一些“知華友華親華”的葡萄牙友人，提升了中國及中國文化在葡萄牙的影響力。

## 二、中國對葡文化外交的嚴峻挑戰

### （一）對葡萄牙的國情研究相對薄弱

對葡萄牙及葡語世界缺乏深入認識成為中國對葡關係亟需破解的難題。由於現實需要，我國對國際社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國研究上，對葡萄牙等中小國家的關注不多、研究不夠。如，當前各類歐洲研究機構基本都是圍繞德、法等大國開展研究，較少關注葡萄牙等歐洲小國。此外，我國對葡語國家因其特殊的歷史淵源而在國際社會構成的密切的“葡語世界”更是缺乏研究。對葡萄牙在葡語世界的特殊價值缺乏足夠的重視，造成了我國對葡萄牙的民族、政治、文化、宗教等國情缺乏足夠細緻的認知。

中葡建交、中葡論壇設立、特別是中葡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確立，中國對葡萄牙的關注與研究日漸增多。也開始成立專門的智庫機

構專司葡萄牙研究。如，2012年1月葡語國家研究中心在對外經貿大學成立，2014年5月“北京外國語大學-里斯本大學-卡蒙斯葡萄牙語言文化中心”在北京外國語大學成立。但不難發現，當前中國對葡萄牙的關注顯然不夠。一方面，全面而專業的研究葡萄牙的機構及人員不多，而且其目前的重點工作還局限於葡萄牙語教學與葡萄牙語言文化交流，無暇顧及葡萄牙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的國情；另一方面，在我們的潛意識裡，往往是以澳門為視窗關注葡萄牙，然後，以葡萄牙為跳板關注歐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的葡語國家，尤其是對中國資源需求影響較大的安哥拉、巴西等國。這就形成了出發點在葡萄牙，而落腳點卻在其他葡語國家的特殊局面。

## （二）中葡關係缺乏足夠的內涵性支撐

中葡關係存在系統性風險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中葡之間的經貿發展不平衡。一是中國與葡萄牙經貿合作前景廣闊，發展勢頭良好，但其規模一直十分有限（見表1）。兩國也並非對方重要的進出口國。據歐盟統計局統計，2015年中葡雙邊貿易額為29.1億美元。其中，葡萄牙對中國出口9.3億美元，佔葡萄牙出口總額的1.7%；自中國進口19.8億美元，佔葡萄牙進口總額的3.0%；中國為葡萄牙第十大出口市場和第七大進口來源地，葡萄牙為中國的第59大出口國和第79大進口國。二是中葡經貿關係呈現出“製成品VS初級產品”的格局。即中國從葡萄牙進口的商品多數是初級產品，向其出口的商品則多以製成品為主。其次，中葡之間的外交關係存在風險。當前，中國與葡萄牙處於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但這種關係中具有不對稱性，不夠扎實深入。主要表現是葡萄牙希冀獲得中國的經濟援助與技術幫助，以幫助其擺脫當前的主權債務危機；而中國則希望獲得葡萄牙在“一個中國”等相關政治領域的道義支持以及中國進入歐盟、非洲、拉美等地區獲取資源和市場時的必要協助。中葡之間的這種互補性可以促進中國與葡萄牙的合作；但也由於兩國之間缺乏足夠的共同關切，使得協調起來有一定的困難，甚至被惡意利用，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風險。

表1 1999-2015年中葡雙邊貿易與中國進出口情況統計表

年份	中葡雙邊貿易額 (億美元)	中國進出口額 (億美元)	中葡雙邊貿易額/ 中國進出口額的比重 (%)
1999	2.5828	3606.3	0.072
2000	3.11	4742.9	0.066
2001	3.33	5096.5	0.065
2002	3.84	6207.68	0.062
2003	5.96	8512	0.070
2004	8.69	11547.4	0.075
2005	12.36	14221.1	0.087
2006	17.18	17606.9	0.098
2007	22.11	21738.3	0.102
2008	26.9	25616.3	0.105
2009	24.04	22072.7	0.109
2010	30.51	29727.6	0.103
2011	39.64	36421	0.109
2012	40.15	38667.6	0.104
2013	39	41600	0.094
2014	32.3	43030	0.075
2015	29.1	37688	0.077

(注：根據中國海關資料整理繪製)

### (三) 戰略規劃與協調機制不夠完善

據瞭解，當前對葡文化外交的相關具體事務由外交部、文化部、教育部、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等多個部門分別承擔。眾多的文化交流決策與執行機構加大了對葡文化外交的協調難度。目前要整合這些力量但還無現成的舉措。同時，面對全球性西方話語霸權，長期以來西方資本控制的各類媒體對中國的報導缺乏公正，造成我國在葡萄牙的

輿論與形象傳播十分不利。另外，在對外傳播中國形象時，我們往往主觀想像，缺乏認真研究，方法也存在欠妥之處。如，2011年我國花鉅資在國外投放《中國國家形象片》，其本意是展示和塑造中國良好的國際新形象，但據英國BBC廣播公司調查認為，其並未達成意想之中的效果。香港浸會大學學者孔慶勤分析，“一方面，國家形象片讓外國人感覺緊張；另一方面，形象不是一個片子就能‘做’出來的，局部的真實就有製造假像的嫌疑，而這樣的宣傳就有可能引來煽風點火效應。”<sup>16</sup>因而，中國必須整合各部門資源、認真研究佈局、協同開展在葡萄牙的文化外交。

### 三、中國對葡文化外交的治理策略

#### （一）構建“三位一體”的融合式對葡文化外交新模式

所謂“一體”，即以葡萄牙人民為中國對葡文化外交的受眾主體，創新出為葡萄牙人民所喜聞樂見的文化產品和交流形式。文化軟實力的同化作用既取決於該文化是否具有先進性，也取決於這一文化被文化受眾內化的程度。只有與葡萄牙人民的精神需求產生共振、發生共鳴的文化才能內化為葡萄牙人民的文化價值觀念和行為目標，從而產生中華文化認同。

所謂“三位”，即從三個方面協同切入對葡文化外交。其一，中國政府對葡萄牙政府的文化外交，主要考慮是從宏觀層面制定相關的對葡文化外交政策，簽訂雙方合作條約，組建或協調相關的機構以便於順暢地銜接對葡文化交流與合作。其二，中國政府要以更加開放、包容的態度適時地組織對葡萄牙人民的文化外交。積極運用我國豐富多彩的優質文化資源，開展多種多樣的中西文化交流活動，使葡萄牙人民更好地認識中國國情、中國政府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好地知曉文化中國，維護我國良好的國家形象。其三，鼓勵並支持民間的對葡文化交流。國之相交在於民之相親。要注重加強中國人民和葡萄牙人民之間的文化相親，情感相融。鼓勵並支援人民團體、民間組織、

---

16. “中國國家形象片產生負面影響”，《新快報》，2011年11月17日。

民營企業、個人和海外僑胞從事對葡文化交流，促進中葡人民對彼此社會風情、人文歷史的深入瞭解，築牢兩國友好的世代基石。

所謂“融合式”，即要將對葡文化外交融入中國大外交戰略之中。一方面，對葡文化外交要融入中國對葡外交，與對葡經濟外交、政治外交、軍事外交全面銜接，共同構成對葡外交的有機體系；另一方面，考慮到葡萄牙在當今葡語國家中具有重要的影響，特別是葡語國家深受葡萄牙語言文化、社會習俗、法律制度等的影響，對葡文化外交不能局限於葡萄牙一國。要在此基礎上，跳出葡萄牙，將其融合進對葡語世界的文化外交。

## （二）深耕對葡文化外交工作

第一，體味葡萄牙國情民意，善打情感牌。葡萄牙是發達國家中的小國，中國是大國中的發展中國家，兩國在某種程度上易於接近；加之，盧濟塔尼亞民族與中華民族一樣，都歷經上千年的民族融合，具有豐富的傳統文化，令人驕傲的歷史。近代以來，都在各自追求本民族的偉大復興。因而，比較容易產生共鳴。只要我們深入瞭解葡萄牙人的歷史文化和風土人情，採用務實主義的態度切實加強對葡文化交流與合作，實施對其有益的文化交流，葡萄牙方面是會積極回應的。如，在葡萄牙訪問時，除了必要的官方會見外，可通過走訪葡萄牙民間，瞭解葡萄牙社會，拜謁葡萄牙先驅，以促進葡萄牙民眾對中國的瞭解，提升對葡萄牙民眾的感召力和影響力。

第二，根據葡萄牙文化政策特點增強對葡文化外交的針對性。針對葡萄牙在對外文化交流中看重葡萄牙語言和文化合作的政策，積極加強與葡萄牙在葡語語言和文化方面的合作。針對葡萄牙對外文化交流活動的執行主要是通過卡蒙斯學院等半官方機構和高校與科研院所執行的情況，應主動加強與這些組織的聯繫交流，並且也通過孔子學院、高校等相關機構來對接具體實施。特別是要積極將孔子學院建設成為聯通“中國夢”與“葡萄牙夢”的“心靈高鐵”和體現中國“軟實力”的文化品牌。針對葡萄牙對文化創意的關切，應該加強我們的文化創意，打造出更加符合葡萄牙人口味的文化作品，同時，鼓勵和支持有實力的文化公司參與葡萄牙的文化創意產業合作。

第三，注重對葡萄牙青年的文化教育。一方面，在對葡萄牙開展文化交流與合作時，要特別考慮到以葡萄牙的年輕人為交流對象，開展為葡萄牙青年所喜聞樂見的文化專案；另一方面，要逐步採取有力措施吸引葡萄牙年輕人到中國留學與旅行。比如，可以簡化葡萄牙公民來華簽證手續，增加葡萄牙來華留學生的獎學金名額和金額，特別是要讓他們有機會長時間留在中國學習或工作，以便其身臨其境地感知中國與中國文化。

第四，要以文化為先導，唱經濟之戲，特別是加強中葡文化產業合作。“中葡論壇”為中葡關係發展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臺。要在“中葡論壇”的機制下，創造出中葡文化產業合作的新的增長點，讓葡萄牙在經濟領域更多地依賴於中國；著力發展中葡之間文化產業合作，讓中國文化深入到葡萄牙人的衣食住行及娛樂生活之中。

第五，制度化對葡文化外交。儘管當前中葡關係發展良好，我國對葡文化外交工作取得了較好的成效，但我們發現大多數對葡文化活動都是隨機的，並沒有形成固定的機制，受各種因素的影響較為明顯。因此，要不斷將對葡文化外交細化、機制化、制度化，簽訂必要的法律條約保證對葡文化外交能夠持續進行。

### （三）加強澳門平臺及其軟實力建設

澳門是中葡政治、經濟、文化交匯融合的前沿中心。一定意義上講，澳門深暗中葡兩國的政治文化、社會風俗、民族感情，能夠較好地理解並溝通中葡雙方。借助澳門的平臺優勢開展對葡文化外交對於深化中葡關係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首先，加強澳門的葡語國家研究。依託澳門的葡語國家研究中心，整合國內外各種資源對葡語各國的國情社情、風土人情進行全方位的研究，增強澳門的話語權，使澳門成為葡語國家研究的主陣地。

其次，加強澳門的歷史文化遺產保護。澳門與葡語系國家在語言文化背景、社會習俗、法律體系等方面具有較強的同質性，保護澳門的歷史文化遺跡能夠增強澳門對葡語系國家的吸引力，強化中國同葡

語國家發展經貿聯繫的文化與情感紐帶，促使澳門成為中國與葡語國家互聯互通的重要橋頭堡。

再次，推進澳門的現代金融服務與葡語人才建設。澳門可充分發揮自身金融、港口優勢，充當好中國與葡萄牙等葡語國家之間外匯結算、企業融資擔保、企業經貿合作橋樑作用。除了金融平臺建設之外，更要大力培育獨特的人才優勢，積極培養雙語型的金融人才、翻譯人才、會計人才、管理人才等等，擴大澳門的軟環境優勢。

最後，加大澳門平臺優勢的對外宣傳。澳門既可以為中國在葡語國家的公務或商務活動中提供便利服務，也可以為葡語國家建立或強化與中國的關係提供幫助。澳門特區政府及相關組織既要在中國內地、香港及臺灣地區加大宣傳的力度，讓世界各地的華人企業家、銀行家、學者、媒體等都充分認識到澳門在促進中葡交往中的獨特平臺價值，也要到葡萄牙等葡語系國家去宣傳，讓它們知曉澳門在溝通它們國家與中國關係上的獨特優勢。從而，讓澳門的仲介平臺優勢真正發揮出來。